

会成员国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并且使这些国家对苏联怨声载道,逐步表现出离心离德的趋势。

或许非世界历史性的苏联所产生的更深刻、更加致命性的影响,还在于政治文明领域。对于这方面的负面作用,当然难以像对经济那样进行具体化甚至数量化的阐述,但事实上肯定是存在的。封闭和孤立,不但造成苏联时期的政治建设不能够像马克思、列宁所要求的,充分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且为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残余提供了得以继续生存的土壤。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大党主义和体制的僵化、老化,思想文化领域的个人崇拜、高度的思想垄断等等,实际上都与因长期封闭而缺少与世界先进文明的交往存在着直接性的因果联系。长期封闭以及与世界相隔绝,一方面是阻碍发展、保护落后,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共产党执政中的“温室效应”。二战后期,一大批苏联红军随着战争进程走出国门,在接触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文明成就和生活方式后,立即就产生了对国内状况的不满情绪。他们普遍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并形成改革体制、革除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合理状况和弊病的冲动。这股改革愿望最后当然没有变成具体的行动,但由此也表明了封闭、孤立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极端脆弱性特点。80年代中后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微波和卫星系统取代电缆,通信及大众传媒业极度发达,文化全球化无论在量还是质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像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所指出“20世纪晚期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在地理规模、直接性和速度等方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转变——不仅出现了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技术,而且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和互动的制度化(其中的许多技术形式逐渐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和社会空间)。”<sup>①</sup>150余年前,马克思在谈到鸦片战争对古代中国所产生的文明冲击时,形象地告诉人们: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方式,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一旦这种条件不复存在,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社会解体过程,其情形正如一直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一样。苏联的情况自然并不完全等同于150年前的旧中国,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自由化”之后,随着“西风美雨”纷至沓来,其过程性质就像马克思所形容,长期处于封闭、隔绝状态中的“温室社会主义”立即呈现出现风化瓦解之势,由此而至的必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彻底失败以及苏联作为国家形态的完全解体。

## 苏联剧变的民心基础坍塌分析<sup>\*</sup>

黄永鹏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无论是对于古今的集权统治者还是现代民主国家都是统治者执政的基础。民心向背关乎每一个执政的政治集团的生死存亡。中国战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孟轲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sup>②</sup>回顾苏联剧变事件的发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执政的民心基础已经彻底坍塌。

### 一、营私舞弊、各谋私利,党政干部沦丧公心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被苏共奉为意识形态教育经典的

<sup>①</sup>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sup>②</sup> 《孟子·公孙丑下》。

<sup>\*</sup>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苏共意识形态管控政策的失误与苏共败亡”(项目编号:07JA710024)。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sup>①</sup>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任何时候共产党人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可是,建国以后,苏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逐渐背弃了其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诺言,不仅不能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而且日渐自利腐败。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由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小部分有特权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官僚特权阶层人数越来越多。据估计,当时苏联的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sup>②</sup>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包括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名目繁多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们享有高薪、住房、别墅、汽车、游艇、内部餐厅、商店、休闲度假等内容。

同时,苏联不少领导干部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贪婪腐败。他们为个人私利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打击党内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人。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严重,特权阶层横行无忌。这种贪婪和腐朽,势必反过来影响政治,毒害党和国家。这个特权阶层,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存续时期,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夺取权力为中心,层层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他们需要僵化的体制来谋取私利,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自己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这种权力腐败,使苏共名誉扫地,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的则只占7%!

苏联学者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夫指出“一个从来没有自诩过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资本家过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活,这是一回事;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在更严重的赤贫中间,享受奢侈生活,无论其程度大小,则是另外一回事。”<sup>③</sup>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自我政变,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权利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sup>④</sup>

## 二、无所作为、信心尽失,普通党员丧失党心

斯大林执政后,党内民主逐渐受到削弱和破坏,形成了极端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部长会议主席,还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个人控制一切、垄断一切、制裁一切。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准则,任意践踏集体领导原则。这在他一生的最后15年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会之间相隔了十几年……甚至在战后,也是7年多的时间没有开过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斯大林甚至不想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和谈话。<sup>⑤</sup>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的模式自上而下贯穿苏联的各个环节和部门。

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缺乏民主,没有生机和活力。表面上的“一致”形式上的“服从”掩盖极端的思想混乱、政治分歧和组织涣散,最后使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② A·H·博哈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版,第571页。

③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④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⑤ 《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379页。

的性质、党的理念、党的理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蜕变。

党内权力体制发生背离党章的扭曲,甚至颠倒,只讲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不讲上级对下级负责、接受监督和报告工作,而且,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并把具体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置于权力机关之上,把党的集体领导机关、决策机构变成可有可无的咨询机构。

党内的不同意见,包括合理意见缺乏表达的机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的民主权利甚至政治生命和脑袋得不到制度和法规的应有保障,导致不少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党员和干部冤死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

戈尔巴乔夫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对党员干部队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三年内作了3次人事变动,干部调整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党的干部队伍失去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党的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无法如期进行。改革的急速性不但使其效果难以呈现,反而使其中问题层出不穷。人员的不断变动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主化、公开性的泛滥使党的工作出现严重混乱。这样的党政干部制度改革不但没能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民主集中制从而丧失了对群众的凝聚力,党内分裂以及党内派别众多,使苏共在组织上陷于瓦解。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个人专断、强制命令、党内无民主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假借扩大党内民主之名,否定并抛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允许党内可以有不同纲领的派别,并允许各级地方党组织“自治”、“自主”,可以不服从中央决议,对上级党组织处于半独立状态。这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用一种错误代替了另一种错误,置苏共于解散、分裂的危险境地。<sup>①</sup>

由于在党的各级组织实践中,党的组织生活陷入混乱。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极大破坏,基层党组织无法发挥其功效。普通党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和执行,无法正常参与民主政治,政治参与意识日渐淡薄,失去了对党组织的集体归宿感。而丧失普通党员的支持,既是党失去自身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党失去一直以来赖以维系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桥梁和渠道。由于政治分歧和对党的信心的丧失,1988年下半年苏共退党现象愈演愈烈。“1990年全国共有180万党员退出共产党;1991年,仅前七个月,退党者猛增为240万人,余下的1500多万党员相当多的人陷入了政治疲劳”,<sup>②</sup>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厌倦冷漠,致使党的组织濒临瓦解。

### 三、生活无着、无所适从,亿万民众离德离心

苏联广大民众是感应于共产党的号召和对于共产主义的美好而跟随苏共革命的,为了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原本以为革命胜利了,应该是苦尽甘来。可是,苏联的经济经过短暂的辉煌以后,迅速跌入全面危机,社会经济矛盾不断积累与加深,经济形势逐年恶化。虽然苏联也曾试图利用改革来克服经济危机,但却无法消除其经济体制自身的诸多弊端,反而加深并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经济改革思想和方向的根本转变。改革长期不见成效,经济发展上不去,人们对改革失去信心,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动摇。经济危机导致了相当多的人产生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并诱发了民族危机。苏联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但酿成民族危机,主要是由于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不能给各民族共和国带来高度的经济繁荣和富裕的生活。有些经济发达的共和国急于独立,离开苏联。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和经济危机为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各种危机相互交织、相互推动构成了整个社会危机,从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长期的经济危机毁了人民的生活,而苏共的朝令夕改、倒行逆施、自我否定更把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彻底打倒。回顾苏联70多年的历史,完全是一个破碎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连续性。斯大林把

<sup>①</sup> 高璐佳、李合香《反思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苏共党群关系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否定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形象推翻了;勃涅日列夫再把赫鲁晓夫翻过来,最后,戈尔巴乔夫干脆来个全面否定。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批评无禁区”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鼓励下,被压制已久的苏联报刊和社会舆论开始了对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报复性的揭露和批判,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辩论很快汇成了强大的否定性的颠覆苏联制度的强大洪流,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被描绘成一场“罪恶”的历史与“罪恶”的实践,苏共历史也被说成一团漆黑,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狂热的社会舆论所引导,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sup>①</sup>以至苏联史学家痛心指出“恢复历史真相”成了随心所欲地演绎苏联 70 年的背面。彻底地、一年一年地加以毁坏,到处只挑选黑暗的、阴森森的、悲惨的东西,到处只看到停滞、暴力、劳改营。这是多么努力地在填补历史的“空白点”,以致都没有觉察到,如何在一个美妙的瞬间,不仅历史没有了“空白点”,“连历史本身也不存在了”。<sup>②</sup>这样朝令夕改,昨天还在报纸和电视上大吹特吹的中央指示,今天便成了罪恶的渊薮;刚才还是人民伟大领袖的人物,转眼间便被打成人民公敌。如此的倒行逆施让广大苏联人民无所适从。

苏联剧变的终极原因是苏共自毁长城,成为孤家寡人。苏共历来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加强军队现代化。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控制得太苦,农业发展长期落后,农业集体化没有适应农民发展的需求和心理;对知识分子干预太多,经常混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在苏联剧变中,凡是在居民文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共产党失败得越惨重;对企业统得太死,管得太细,工人没有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搞军队国家化,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导致军队的失控和军人的不满,加上苏共的腐化,使苏共越来越孤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可以说是各个阶层都不满意,甚至苏共党内的干部也不满意,社会浮躁、人心涣散、怨声载道,苏共的形象、威望和动员力急转直下,国内外反对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使苏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国家的分崩离析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sup>③</sup>

## 制度供给过剩与苏联政治的衰朽<sup>\*</sup>

郝宇青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所谓制度供给过剩,是指相对于社会对于制度的需求而言,有些制度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甚至是无效的制度仍然发挥作用。十分明显的是,苏联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政府管制较多的国家,制度供给过剩成为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虽然在苏联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但是,制度供给过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而制度供给过剩则使得苏联的政治生态恶化,导致了其政治的衰朽,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笔者试图探寻苏联制度供给过剩的表现及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以就教于方家。

### 一、苏联制度供给过剩的表现

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弥合共产主义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迅速实现现代化就成为苏联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则需要

① 曹长盛《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山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 7 期。

② 博尔久科夫、利兹洛夫《史学与时期》,莫斯科 1992 年版,第 3-4 页。

③ 黄宗良、肖枫等《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苏联剧变 20 周年若干问题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 年第 4 期。

\*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研究(2007FZZ001)。